

达尔文主义与纳粹种族大屠杀

作者：杰里·伯格曼

<https://www.chuangzaolun.com/%E5%88%9B%E9%80%A0%E7%A7%91%E5%AD%A6%E6%96%87%E7%AB%A0/item/178-%E8%BE%BE%E5%B0%94%E6%96%87%E4%B8%BB%E4%B9%89%E4%B8%8E%E7%BA%B3%E7%B2%B9%E7%A7%8D%E6%97%8F%E5%A4%A7%E5%B1%A0%E6%9D%80.html>

一些纳粹头目和 20 世纪初有影响力的德国生物学家在著述中都曾披露，达尔文学说及其著作对纳粹种族政策有重要影响。希特勒（Hitler）认为，人类基因库可以通过选择性繁育加以改善，就像农民选育优良种牛那样。希特勒政府制定种族政策时，十分倚重达尔文主义，特别是斯宾塞（Spencer）和海克尔（Haeckel）的学说。因此，希特勒政权的一项核心政策便是制定并实施旨在保护“优等种族”的各种政策。最起码必须禁止“劣等种族”的人与被判定为优等种族的人通婚，以减少对优等种族基因库的污染。“优等种族”论者认为，每个物种都有优劣之分，这是达尔文最初提出“适者生存”理论所依据的重要猜想与必要条件。“优等种族论”最后登顶成为“终极方案”，致使大约 600 万犹太人和 400 万其他种族的人惨遭屠杀，他们都被德国科学家判定为“劣等种族”。

导论

导致纳粹种族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多因素中，达尔文学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即弱者在生存斗争中被淘汰才会发生进化。虽然很难评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受人诟病的动机[1]，但无疑达尔文主义催生出的优生学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达尔文主义不仅使纳粹关于种族与战争的意图合法化，而且为他们摇旗呐喊。倘若纳粹党完全接受并一贯持守另外一个信念，就像《圣经·新约》和《圣经·旧约》所教导的那样，认为人类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大屠杀绝不可能发生。

德国主流（自由派）神学及其学派不再教导犹太教-基督教有关人类神圣起源的教义，却以达尔文主义取而代之，这等于公然鼓励大众接受最终酿成大屠杀惨剧 1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学说，由于海克尔 2、3、4、5、6、张伯伦（Chamberlain）7 等人的过度发挥[2]，显然对造成 900 多万人死于集中营，以及大约 4000 万人在这场消耗 6 万亿美元的战争中丧生，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更为不幸的是，科学界学术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广泛认同，1、8、9、10 乃是纳粹主义最终演变为大屠杀的主要原因。

适者（即优胜个体）因其优胜差异而存活，物种又因优胜劣汰而进化，这是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所在。一个物种当中必然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适时变大，大到一定程度便显示出其优胜特征——即适者生存。虽然种族进化过程开始时的差异可能微乎其微，但是存活率的差异适时通过所谓物种形成的过程产生不同的种群，这意味着一个新物种的产生。

“人人生而平等”是平等主义理想，这一理想在当今西方思想意识中深入人心，但并非一直适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¹¹ 这一观点的主要阻力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运动，尤其是其不成熟的“适者生存”世界观。¹⁰、¹² 正如路德摩尔（Ludmerer）指出的，通过选择性繁育可以改善种族的遗传品质的想法犹如柏拉图（Plato）的著作《理想国》一样古已有之，但是：

“……现代优生学思潮直到 19 世纪才兴起，那时人们对优生学产生兴趣有若干缘由，最重要的缘由是进化论，因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的优生学概念——是他首次提出了‘优生学’这个词——是受其表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详尽阐述的优生学学说启发的直接合理的结果。”¹³

代表当时科学界教育界时代精神的达尔文主义，公然影响了纳粹政府的政策走向。¹⁰ 考证现存的 20 世纪德国纳粹运动中产生的及出自许多纳粹科学家支持者之手的文献、著作及手工制品，不难得出这个判断。基思（Keith）认为，纳粹对付当时被视为劣等种族的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手段，很大程度是由他们的信念所决定，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给纳粹分子提供了深谋远虑，能用来极大地改善人类。¹⁴ 特南鲍姆（Tenenbaum）指出，当时德国政治哲学建立在此信念之上，即在进化进程中决定性的因素是：

“斗争，选择，适者生存……所有这些观念和观察……都是达尔文提出的……但这些观念已经在 19 世纪的德国社会哲学界遍地发芽……德国仗着优势固然拥有统治世界之权利的信念顺势而生……德意志帝国与弱国间的‘锤砧’关系昭然若揭。”¹⁴

种族在达尔文主义中的重要性

进化论的依据是，获得一些独有特质的个体在获得新特质后，相比那些未获得新特质的个体，更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存活。优等个体更有可能存活，也更可能把这些优秀特质传给后代，使这些优秀个体大量繁衍，而“劣等”个体最终会消亡。假如一个物种内的各个个体全然没有优劣之分，自然选择则无从选起，该物种就会停止进化。

优劣之异逐渐导致新种族的产生，其中部分种群有生存优势，这些新种族成为优等种族或进化为更高级的种族。当一种特质，因其赋予那些拥有它的个体以生存优势，从而最终普及到整个种族时，这个种族将进化成一种更高级的种族。希特勒和纳粹党宣称，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把这门公认的“科学”应用于社会。他们还宣称：“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思想不是进化，而是选择。进化……体现了选择的结果。”¹⁶希特勒强调要建设更美好的社会，“我们(纳粹分子)必须懂科学，必须与科学合作。”

雅利安人比其他一切种族都高贵，他们认为进化产生的优势不仅赋予他们征服一切外族的权利，还给了他们这个责任。种族概念是纳粹哲学的重要支撑。特南鲍姆认为纳粹把达尔文主义：

“……毫无保留地完全融合到了政治体制中，纳粹的政治词典充斥着空间、斗争、选择，灭绝（德语为 *Ausmerzen*）这样的词汇。纳粹的逻辑三段论[3]讲得十分露骨：世界如丛林，丛林任瓜分，强者赢地盘，弱者非死即杀… …。”¹⁷

在 1933 年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宣称“优等种族要征服劣等种族……这是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一种权利，它可以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权利”，因为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¹⁵

1938 年在德国纽伦堡，希特勒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帝国建党节检阅党卫军此照系埃斯特·贝克霍弗的藏品，蒙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照片档案馆提供

1938 年在德国纽伦堡，希特勒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帝国建党节检阅党卫军

希特勒认为人是动物，从牲畜育种中学到的遗传学定律也同样适用人类。纳粹分子相信，他们必须引领人类的进化进程，促进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听任自然力量和自然时机把控进化。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隔离“劣等”种族，以防他们进一步污染雅利安基因库。大肆宣传这个信念骗取了民众对此政策的广泛支持，在知识阶层中形成了共识：某些种族的遗传基因是劣等的，这已经在科学上被达尔文主义所“证明”。纳粹相信，他们只是在用已被科学证明的事实培育一个优秀的人种，这是他们创造更美好世界计划的一部分：“大企业式国家[4]的任务是进行优生学选择或人工选择——把政治当作应用生物学来用。”^{18,19}

“……大约自孩提时起——就对进化论学说如痴如迷。无论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还是在公众演说中，进化论思想——相当露骨直白——全都出自他那骇人听闻的邪恶想法……。希特勒推断道……优等种族必将永远征服劣等种族”²早在 1925 年，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第四章就概述了他的结论：达尔文主义是德国未来成功的唯一基础，此书系指他最著名的著作——英文版的《我的奋斗》。正如克拉克（Clark）的结论所云：阿道夫·希特勒

希克曼(Hickman)补充说，希特勒“……成为进化论坚定的追随者和鼓吹者绝非偶然。无论他的精神异常有多么复杂多么根深蒂固的深层原因，但毫无疑问

（斗争的观念极其重要，因为）……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若干进化论观点，其中，斗争、适者生存及优胜劣汰，使社会更美好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 21

还应指出，纳粹相信进化可以由科学家管控繁育出“优等种族”，并奉之为纳粹主义的核心理念，纳粹主义还从许多其他方面找到了支持依据：

“……纳粹思想凶如烈酒。但是，由于这一系列邪恶思想和无法摆脱的恐惧……依据这项庞大的人种纯化计划，大多能得到最清晰的解读，所以纳粹帝国的社会政策，以及相当多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是他们那些邪恶思想和恐惧的产物。” 22

因此，纳粹关于达尔文进化论和种族的信念，是邪恶思想与重大事件的致命结合的主要推手，而这种致命结合导致了种族大屠杀和二战的爆发。

纳粹理论及学说的一个核心要点是……进化论，……所有生物已完成高一级的进化，而……进化迟滞的劣等生物……应该积极根除，……自然选择可以并且应该辅以人为手段，因此（纳粹）采取了政治手段消灭……犹太人和……黑人，他们被认为是“未开化的”劣等人种 23。

“优等种族”“劣等人种”“种族污染”，甚至进化这个词（德语为 *Entwicklung*）都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头子频频提及。希特勒的种族观不是源自人们常说的边缘科学，而是：

“……简单明确的德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在德国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更重要的是被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多数德国人奉为科学真理。近期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及希特勒的学术成果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达尔文学说的应用）具有纳粹主义的显著特征。国家社会主义‘生物政策’……（是）基于一种极端不公的神秘生物学信仰，一种基于自然律中永远为生存而战、适者生存的单一的、反超越道德的虚无主义，最终在公共政策中动用国家权力贯彻自然选择的法则……24

知名纳粹分子在著作和演说中频频提及人能掌控并利用达尔文主义繁育“高贵”人种的观念。25 实现达尔文进化论的目标需要用公开野蛮的行为无情地淘汰不适者。

“德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轮廓(是)……人类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特别超然的品性，也没有特殊的人性。另一方面，从生物学上来看，德国人属于优等种族……政治只是生物学家法则的直接应用。海克尔和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伙伴们从根本上推动了这股思潮，使其后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设想的核心部分。大企业式国家的任务是进行优生学选择或人工选择……” 18

希特勒甚至曾坦言,我们纳粹“……是野蛮人!我们愿做野蛮人,这是个光荣的称号(因为,有了这个称号)我们就可以让世界重生……”²⁶作为进化论者,希特勒有意让他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契合进化论”。²⁷基思(Keith)补充道:

“若战争是进化的产物——这点我坚信不疑——那么进化论就已经‘发疯’,它狂暴至极,欲毁坏人类世界的正常功能而后快——人类生活中的种种竞争,诸如人类部落间的,国家或种族间的竞争,全都无法正常进行。人类无法消除战争拯救自己,也无法让人性摆脱进化法则强加给人类的惩罚。人……能让进化法则废止吗?……我尚未找到立竿见影、切实可行的办法。‘人性无可逃避。’是德国一气灌下了一大桶进化论烈酒,挥起进化大棒,放荡不羁,把欧洲打入流血的浴缸,所以,没有证据表明进化法则是恶魔。把人带出丛林使之成为万兽之王的法则不可能一无是处。”²⁸

犹太人在德国和达尔文主义中的地位

起初德国优生计划的领导层的反犹情绪比英国领导层低。大多德国早期优生学者认为德国犹太人属雅利安人,因此优生学运动受到众多国内外犹太教授和医生的支持。德国优生学理论只是逐渐纳入了犹太人,随后才立法明令把他们清除出雅利安人。

达尔文种族主义分子的观念也逐渐渗透到德国社会许多起初不受其影响的其他领域。⁹以“保持德国种族纯净”为宗旨的泛德联盟起初并不公开仇视犹太人,反而允许德化的犹太人加入联盟。许多德国优生学者认为,虽然黑人和吉普赛人属劣等种族,但他们的种族理论不适用于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德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施莱恩(Schleunes)补充说,截至1903年种族思想已完全贯穿在联盟的人种纯化计划中,后来到了1912年,泛德联盟申明,“人种纯化原则”是泛德联盟的立盟之本,于是立即把犹太人全部逐出了联盟。²⁹

尽管种族观念在科学界影响极大,但犹太人在1930年之前几乎不受影响。大多数德籍犹太人为自己的身份自豪,他们视自己首要身份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许多犹太人主动融入到德国知识界,以此修正了德国知识界的诸多观念。犹太人融入了德国人的生活,他们大多认为,德国人的反犹情绪不会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多数犹太人深信德国是他们安全的港湾。³⁰很多犹太人仍坚信《圣经》的创世记中有关创造的记载,不接受种族主义的观点,也不相信达尔文主义,而后来在德国发生的事显然不被犹太基因学家甚至犹太优生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认可。

“在德国,优生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优生学运动感到喜忧参半。……但希特勒上台后制定的一些优生学实际实施的细则却明显不受欢迎。优生学家把目光投向了

美国，在那里婚姻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但政治自由的坚实传统却得以保存。” 31

希特勒的优种目标

与其说纳粹政策源自他们对犹太或其他民族的憎恨，倒不如说源自他们自己臆想的目标——防止“污染”优等种族。希特勒详细阐述了他的达尔文观，他把强者屠杀弱者比作猫吃老鼠，由此得出结论说，犹太人最终必遭清洗，因为他们

“……会使其他民族衰败……从长远来讲，大自然会淘汰有害因素。……人会遭到生物本该弱肉强食的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排斥。蜻蜓吃苍蝇，小鸟吃蜻蜓，大鸟吃小鸟……懂得自然法则……我们才能遵守。” 32

1944年营囚禁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儿童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馆提供

1944年营囚禁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儿童

希特勒辩解说，因此，政府必须清楚并遵行这种“自然法则”，尤其是“适者生存”法则，“这个法则，混沌之初孕育了人类，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所以政府必须协助淘汰劣等种族，至少把他们隔绝起来。希特勒还辩解说：

“如果我能接受一条像《圣经》十诫那般神圣的诫命，那就是‘应该保留这个物种’这一条。作为个体其生命并无太大价值。若个体被大自然视为宝贵，大自然就会保留他。苍蝇产卵数百万，但极少能孵卵而出——而苍蝇依然可以繁衍下去。” 33

希特勒决心一定要禁止雅利安种族与非雅利安种族通婚，他对同非雅利安种族通婚的忧虑最终化为“终极方案”。希特勒相信劣等种族灭绝之时，人们将会因他的优种计划带给人类的进步永远感恩戴德。

“德国人属优等人种，注定会因着种族进化拥有荣耀的未来。因此必须隔离犹太人，以防和犹太人通婚。一旦发生这样的异族通婚，大自然‘建立人类进化高级阶段的一切努力也许就此落空’（《我的奋斗》）。” 20

不仅个体远不如种族重要，而且纳粹认为某些种族并非人类，乃是动物：

“被贴上劣等人标签的犹太人后来竟被视为非人类。无论从集体主义、还是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消灭他们都是合理合法的。在德国政府眼里……他们不属于人类。” 34

最终达尔文主义运动成为“19~20世纪德国知识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也）完全可以当做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学说的前奏”。³⁵ 相比世界其他国家，为何达尔文进化论在德国传播更快，更被人接受？

利用进化论让德国存在种族主义名正言顺

施莱恩尖锐地指出，达尔文 1859 年出版的著作对德国和对犹政策有直接影响，其原因在于：

“达尔文的竞争生存的学说……得到当时最新科学观点的接纳，使优等民族、劣等民族、优等国家、劣等国家这些概念名正言顺，使优劣民族之间、优劣国家之间的争斗合法化。”³⁶

达尔文进化论及其在德国的主要代言人、声名最显赫的科学家海克尔教授的著作，让种族主义分子有恃无恐，坚信自己的种族信念有真凭实据。³⁷ 支持进化论科学的确立，较之其他方式更加助长种族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而‘过去和今天达尔文及其追随者关于种族的种种预判其实都是科学真理’的说法也非常蛊惑人心。³⁶

科学赋予种族主义者的观点无与伦比的权威。当时最杰出的一位动物行为科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常被誉为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他指出：

“……正如治疗癌症的最好方法是尽快根除寄生瘤，优等种族人群同样必须采取极端手段保护自己不受被污染的劣等种族人群的恶劣社会影响。[5]如果劣等人群没能从（健康）人群中有效地清除出去，那么——正如坐视恶性肿瘤在人体中扩散——它们不但会毁灭自己，也会毁灭宿主身体。”³⁸

在纳粹制定要消灭寄生肿瘤式的低等种族大屠杀政策时，劳伦兹(Lorenz)著作的作用举足轻重。德国政府确保让“德国人”保持种族优势的各项计划非常周密，使种族主义几乎无懈可击。虽然金（King）曾公开抨击“大屠杀打着基因科学的幌子作恶”，³⁹ 但那个时代的政府和大学精英的立场非常坚定，就连当代都很少有科学家真正质疑过。德国人民的反犹态度只是导致大屠杀的部分原因，只是当达尔文主义同先前存在的反犹态度掺和到一起时，才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愈发极端的优生学

优生计划的首要步骤是要确定哪些种族是优等种族；此标准受到文化的极大影响。理想的特征为：

“……据人种理论家汉斯 F.K. 昆塔(Hans F.K. Günther)的描述，此类人：身材修长，头骨较长，脸庞较窄，白里透红，发质柔软，金发淡眼，眼距较宽，鼻梁高，下颌略凸。”⁴⁰

外在特征虽能使绝大多数人对种族作出笼统的分类，但深入观察时，纳粹分子就发觉种族特征很难界定。在他们眼里的劣等种族，诸如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很难和纯雅利安种族区分开来。按种族给人分类遴选“最优种族”时，纳粹测量了各种各样的人的体貌特征，包括颅骨尺寸。纳粹分子严重依赖耶拿大学“种族学”教授汉斯·K.F. 昆塔（Hans F.K. Günther）的著作。虽然昆塔教授“个人同纳粹党的关系时有风波，但他的种族思想却得到了认可”。他的思想得到德国政府各层面的支持，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⁴¹ 昆塔意识到，虽然“一个种族整体上也许不纯，但内部成员却有某些共同的优秀特征”，生搬硬套的刻板标准就这样逐渐成型了。⁴¹

昆塔断定所有的雅利安人都有理想的北欧人体型，这种体型和他所认为的混血犹太人的截然不同。昆塔重视研究人的家族谱系，人类学头骨测量和体貌特征评价，这些数据都用于确定他们的种族。即便体貌特征受到重视，“但人体是灵魂的展示厅”“灵魂才是首要的。”⁴² 有优等种族必要特征的女性被精选出来安置在特别的房子里，只要还把她们留在人种纯化计划内，就让她们不断怀孕。然而，对此项优种实验中所育后代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智商退向群体平均值，且后代的智商总体低于父母的。这一点现在众所周知。

坏血学说

达尔文主义不仅影响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影响了其他文化群体和族裔群体。甚至精神病人随后都被归入此类，部分原因是那时有人相信遗传和精神疾病密切相关（可能他们体内有犹太人或非雅利安人的血液），因此，犹太人必须被毁灭。波力可夫(Poliakov)注意到，20 世纪早期很多知识分子认可先父遗传理论，其理念为“坏血”会永久性地污染种族血脉，“坏血排斥好血，正如假币取代真币”。⁴³ 唯种族灭绝可永久清除劣等遗传链条，从而推动物种进化。

达尔文甚至收集了大量的案例，由此得出结论说坏血污染整个遗传链条，会产生永久不纯的后代。众多有名望的生物学家如慕尼黑大学的恩斯特·芮丁(Ernst Ruedin)及其同僚赫尔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后来还有耶鲁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尤金·卡恩(Eugene Kahn)纷纷积极倡导此遗传学说，他们也是德国为防止有缺陷的人或“劣等”人污染雅利安基因库而立的几部强制绝育法令的起草者，随后“有劣等遗传基因的人”被判为“无用的废渣”，大屠杀就有法可依了。被断定为劣等人种的群体逐渐扩大至其他种族和民族，后来就连体弱年老者，癫痫病人，轻度或重度精神病患者，聋哑人，甚至身患绝症的人群也被囊括进来。1,44

再后来，“劣等人种”扩大到黑色人种、黄色人种（又称蒙古人种）、吉普赛人，和那些没有通过颅相学种族测试的人，那是纳粹公然巧妙设计的一套测试，人们现在知道那些测试毫无价值。45 杰西·欧文(Jesse Owen)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夺得四枚金牌后，希特勒竟斥责美国人居然让黑人进入比赛。46

一些进化论者甚至鼓噪说，从进化论角度讲女性不如男性。罗伯特·沃顿伯格(Robert Wartenberg)博士，后来成为加州杰出的神经学教授，认为女性没有“男性的保护”就无法生存，他试图以此证明男优女劣。他的结论是：作为弱者的女性受到此种保护才没被快速淘汰，因而进化速度较慢，所以大自然对女性的选择逊于对男性。尚不清楚怎样从女性中“挑出”弱者进行淘汰，也不知道“弱者”的判断标准。纳粹德国公开禁止女性从事某些职业，法律要求她们做好传统女性的角色。47

进化论与纳粹德国的战争

达尔文主义不仅使德国人对他们近期的军事动作有了有理有据的诠释，而且也为他们未来的军事入侵提供了正当理由：“德国在俾斯麦当政期间的军事成就完全契合达尔文主义……为生存而战的思想，（显明）德国有适应战争的能力。”48 战争是股积极力量，因为它不仅淘汰了“劣等”种族，而且还剔除了“优等”种族中的弱者。希特勒不仅公然蓄意繁育一个优等种族，而且在种族灭绝和战争政策中极度公开推崇达尔文思想。25 这是纳粹德国公然崇尚战争的部分原因，因为战争是淘汰最优种族中不适者的重要手段，也是“升级种族”的必要步骤。克拉克大量引用了《我的奋斗》一书的观点，遂得出结论：

“希特勒对国际联盟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基于同样之原则：‘世界法庭……竟会是个遭人嘲笑的笑柄……整个自然界充满着弱肉强食生死之战——强者永远胜出，如若不然大自然会了无生机。任何国家，凡（违背）此基本法则者必衰无疑。……想活必战。在这个世界上，争斗不息是生命法则，不想争斗就没

有生存权。’不这样想就是‘冒犯’大自然。‘大自然会报以悲伤，苦难和疾患’”。49

希特勒强调，德国的强大主要因为他们是沙文主义者，所以，他们几百年来不断淘汰其中的弱者。50 然德国人对战争并不陌生，但这个新理由对其政策提供了强力支持。消灭弱小种族是进化的主要源泉，威伽姆（Wiggam）就此做了充分解读：

“……曾几何时人类大脑和其近亲类人猿即猿猴相比几乎不分伯仲，但人类用拳打、用脚踢，用牙咬，……以智克敌，智商不济体力不支之辈皆被屠戮罄尽，唯此人脑才得以极大扩充，人，即便体型不魁伟，却以智慧灵巧见长……” 51

换句话讲，战争从长远来看确有助益，因为唯有生死相搏，人类才能进化。希特勒甚至宣称，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因不断的战争才得以保存，这种矛盾的论调他竟奉为真理。很多和他同时代的重要科学家也公开声援此论调：海克尔尤为赞赏古斯巴达人，他认为他们是通过社会批准的生物优选机制胜出的成功优秀者。斯巴达人只“保留完全健壮的儿童”，其他的儿童一律消灭，这使斯巴达人“一直体格健壮充满活力。” 52 德国应效仿斯巴达人的做法，因为灭杀畸形婴和病婴“无论对婴儿和对社会都是有益的”。毕竟，“人人价值均等”“人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权利”这样的说法，只是“传统的教条”，不见得是科学真理。18,53

然而，人们通常假定，欧洲文明的进步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这主要因为欧洲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好战秉性，但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除了生活在食物殷充的某些小岛的部落群体或在极度寒冷地区的人们以外，战争实际上几乎是全人类特有的。54 历史上非洲许多部落不断卷入战争，亚洲和美洲多数国家也不例外。

纳粹主义和宗教

优生运动的很大阻力来自德国基督徒。希特勒在天主教受洗，但他从未被逐出教会，他显然“自认是个很好的罗马天主教徒”，有时讲话用宗教语言。他成年后对基督教满怀强烈的甚至形于言表的厌恶，大多数纳粹党头子大概也如此。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希特勒公然试图利用教会达到自己的目的。55 说起对基督教的态度，有次他坦言基督教是：

“……生编硬造出来的谎言，必须要粉碎。必须唯罗马教皇马首是瞻。年轻时我想过必须动手...用炸药(摧毁宗教)。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宗教)有点微妙……。

教会最后终结的时候必定要……在圣彼得的宝座上，一个老态龙钟(年迈失忆)的司仪牧师;牧师面对着几个邪恶的老太婆……健硕聪慧的年轻人站在我们这边……不可能让人类永远遭辖制受欺骗……把基督教强加给我们德国人只不过是6~8世纪的事……在那之前,没有这种宗教我们德国人本来就生活得挺好。而今我有6个师的党卫军,[6]他们压根不关心什么宗教，这不妨碍他们赴死时灵魂得到安息。” 56

在希特勒下面的话语中,他的意思再清晰不过：被寄予厚望的德国年轻人“对宗教事务漠不关心”。正如基思所说，纳粹党认为,基督教和达尔文主义水火不容。米尔纳(Milner)谈到德国进化之父海克尔时，引述了海克尔所著《自然创造史》中的一句话：“标榜满有博爱和仁慈道德的基督教会是一种黔驴技穷的骗局，是对自然秩序的歪曲。” 57 海克尔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主要因为基督教：

“……不分种族与肤色；基督教意欲打破一切种族之藩篱。为此，基督教同大自然对抗，大自然经历的年代之漫长，过程之多难，才得以进化出如此多样的人类种族,难道这不是大自然进化的硕果？难道我们不可说基督教和进化论的宗旨背道而驰吗？” 58

摆放在巨大墓穴里的囚犯尸骸马文斯·普林格尔收藏，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馆提供

摆放在巨大墓穴里的囚犯尸骸

反宗教是德国科学的突出特征，之后的德国政治理论起初也从一开始就反宗教，正如斯坦恩(Stein)有一次在题为“论进化：达尔文的学说”的演讲中总结的海克尔理论那样：

“……(海克尔)辩解说达尔文没错……人类无疑是从动物王国进化来的。于是，海克尔由此跨出了致命的一步，第一次在德国开始大肆鼓吹达尔文主义，正如达尔文所言明的，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受进化法则、自然选择法则和生物学法则的支配。舍此言他，皆为落后迷信。当然，人所创立的宗教也属此类，已成为科学和社会进步的阻碍。” 59

马丁·博尔曼是希特勒多年最亲密的伙伴，位居纳粹德国权力巅峰的人物之一，他同样毫不掩饰：教会反对进化论，因此必须受到谴责，而纳粹站在科学与进化论的一边。再者，纳粹和基督教的理念相悖，因为基督教：

“……建立在人们无知的基础上，并尽力让众多的人陷在无知中……。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基于科学基础之上。基督教大约两千年前制定的原则一成不变，渐渐僵化成为生物排他性的教条。而国家社会主义若想进一步完成其使命，必须始终根据最新科学研究数据来指导自己” 60

博尔曼还称基督教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

“……科学知识对基督教会生存构成威胁。因此，他们用神学这种伪科学不遗余力地压制或伪造科学研究。与本质上源自犹太教的基督教理念相比，我们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站得更高，因此我们不需要基督教。” 60

亨伯（Humber）指出，希特勒认为黑人是“亦猿亦人的怪物”，所以他禁止德国基督徒：

“……去‘中非’组建训练‘黑人宣教团’，那样会把‘健健康康的……人变成一群不中用的杂种。’在他书中‘民族与种族’一章中，他说，‘优等种族必须淘汰劣等种族，万不可与劣等种族通婚[7]，否则会失去他自身的优势。唯有天生懦弱之人才视此为残忍，但毕竟他仅是弱小有限的人；因为若此法则不能畅行其道，任何有可能进化成为优等种族的有机生命都不可能出现。’在后来几页，他又写道，‘想活命的就让他们去战斗吧，不想在这个永远争斗的世界里为生存而战的人就不配活在世上’。” 61

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小小集中营”囚犯美国国家档案馆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馆提供

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小小集中营”囚犯正从木制铺位向外张望，他们三人一组共用一“床”。

有文学评论指出不存在种族仇视思维的历史创造论立场如能得以广泛接受，德国将难以滋生种族主义。基于圣经的理念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创世记讲到最初创造了“两种人类”；亚当和夏娃，他们有优秀的血统，再就是“地上的走兽”，低等的黑人血统。62，63，然而很少人认可这种理念。

有文献评论指出，如果当年种族诅咒论的历史创造地位没有得到广泛承认，德国就很难滋生种族主义。有个关于《圣经》的理论声称，“创世记”讲到神最初创造了“两种人”，亚当和夏娃，他们有优秀的血统；神还创造了“地上的走兽”，他们的血统是劣等黑色的62，63。然而很少人认可这种观点。

相对来讲，直接论述达尔文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科研成果寥寥无几——许多进化论者对此话题避而不谈，因为进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优劣种族的选择。有篇对达尔文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最佳评论明确记录，纳粹主义者确信：他们的大屠杀计划完全依据进化科学。64 最近，数篇知名文章涉及此话题，其坦率诚实的笔触令人惊讶。65 纳粹主义的万恶核心源于达尔文主义，所以我们必须看懂历史避免让它再次重演。引用希特勒的话，谁没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谁就注定重蹈覆辙。66 诚然，有些不曾接受进化论的人，支持了那些顺应甚至拥护种族主义的非进化理论。然而此类人寥寥可数，他们创立的理论仿佛大多用来回应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或为证明现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纳粹主义——应用进化论

从我们现今的视角来看，很多人认为二战及战后种种恶果源于一个邪恶狂徒的妄想及其沆瀣一气的政府。然而希特勒认为自己不是在做恶，而是在造福人类。他认为许多年后，全世界都会对他和他的人种纯化计划感激不尽，因为他的人种纯化计划禁止与劣等种族通婚，制止了种族污染，从而使人类基因达成更高级的进化。

“希特勒毕竟深受 19 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流派学说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类犹如生物材料，总是同筹划建立某种社会的冲动息息相关。希特勒确信德国种族正在瓦解，正在因错误繁育而衰退，其原因在于雅利安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及所有非雅利安人的异族滥交，污染着种族的血统。一系列积极的治疗方法应运而生：讲究种族卫生，用优生学择偶，用优选劣汰的方法进行人类繁育。” 67

有些人再三再四为希特勒辩解，说他费尽心机地把众多劣等种族的人投入集中营不是什么严惩重罚，而是一种保护性安全措施，正如隔离病人不让传染病扩散那样。拿哈斯(Haas)的话讲，纳粹分子认为“杀掉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其实在客观上起到了更好地造福人类的作用，既科学又合理”。68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oess)也说过：“这种斗争，最新科学观已解释为正当，证实了种族主义者的民族和国家都有优劣之分、他们之间有优胜劣汰之斗争的观点是合理的。” 69 德国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达尔文主义的危害，诺迪施奥德(Nordenskiöld)[8]记载，1875 年普鲁士王国[9]教育部长曾颁发禁令，一度禁止达尔文主义的传播：

“……普鲁士王国教育部长发布通告，严令禁止本国小学校长与达尔文主义扯上任何瓜葛……以保护在校学童免受其蛊惑。”

一个有趣的问题提出来了，如果那条禁令一直有效，纳粹大屠杀还会发生吗？海克尔身处这场论战的中心，获得了自由思考的人们的大力支持：

“……这个热切的愿望很容易实现，在禁传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严格措施实施期间，比如前文提到的学校不准讲授达尔文主义课程的禁令，就有一群思想言论自由的朋友，心怀热切希望，聚集在海克尔的身边，他们可不在乎他那许多妄想。……结果更加证明海克尔的理论言之有理；达尔文主义或许在学校得以禁止，但进化论的思想和方法却到处渗透……不可否认，海克尔对此结果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大多数人大很多；他的言辞，凡有价值的，都已成为永恒，而他的大谬不然竟理所应当地被人遗忘” 70

如果今天的生物学家发表以上言论，他肯定会删掉“理所当然”这四个字，因为今天海格尔被认为是个肆无忌惮的造謠大师，他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发生的可怕事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虽然达尔文主义对大屠杀的影响记录在案有据可查，但大众媒体却一直极力淡化。就达尔文主义、纳粹种族理论，以及依据该理论制定的政策三者间的密切关系，现代的作家往往遮遮掩掩，视而不见，甚至蓄意扭曲。但斯坦（Stein）告诫说：

“几乎可以断定，种族中心主义思想、种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和排外思想的历史，是人们用科学的历史，也是科学家支持这些思想和社会运动的行动史。很多时候，科学显然只是用作原材料或证据，由热衷于这些思想的政治行动者用来佐证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大多数当代社会生物学家和生物政治学[10]者都认为，以这种方式用科学的种种图谋其实只是伪科学……” 71

他还说，几乎可以断定，当代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态度源于：

“……对历史的某种蓄意误读。种族中心主义等的历史，也是当时许多备受尊敬的科学家的历史，他们都用其科学家的权威以科学的名义相当积极地推动和支持种族主义、排外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因此，如果当代科学家利用现代科学来推进种族主义，那只是库恩[11]式遗忘或库恩式历史粉饰的一种形式，称过去的滥用只是伪科学，从而消除人们对当代可能滥用科学的担忧。” 71

达尔文不只是回应人们常常对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的断言。用赫尔（Hull）的话说，“我们都频频听到，达尔文学说之所以充满……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是因为达尔文所处的社会同样表现出那些歧视。” 赫尔没怎么回应从达尔文时代至今的这个变化，他指出，达尔文不至于“那么欠缺经验，他只是把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看成是自然特征罢了。” 72

纳粹主义往往被当做让人警觉宗教狂热危险的例子，它只是偶然在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优生学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前文提到的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倡导的自然选择论为优生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优生学在当今世界依然阴魂不散。直到1955年，一位加拿大动物学教授指出“有一点或许意义最重大，他（达尔文）终于把人性从教会的禁锢中大大解放出来，为他的同胞赢得了几个世纪都未曾有过的思想自由”。73他还称，削弱教会在社会的影响力不仅使人们发现了进化方法，而且发现了人类运用这些方法的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人类可以引导进化，也可以引导人类自身的进化，甚至还有更糟的，可以对抗进化的推动力，阻止进化，致使人类退化。

罗文指出，人类悲哀地选择了对抗进化。“选择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一如既往。伟大的达尔文学说仍在……”。后来他又补充道，“人获得智力后在动物界开启了前所未有的一条新路，走这条路靠的不是体力的增强，而是智力的增长，同样还有理智的选择。” 74 遗憾的是，他竟得出结论：人类正在“拯救”智力上的劣等人，却没能依据生物法则把事情管好。74 这种说法听起来委婉，实则明确：进化论者认为谁不适应，谁就要被淘汰，至少我们应该少费力去拯救他们，应该让大自然去做优胜劣汰的工作。我们若不这样做，人类最终会灭亡。

结语

希特勒坚信达尔文进化论是真理，把自己看成人类现代的救星。他觉得有一天人类社会将尊他为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全人类的大恩人。通过繁育优等人种，世界会把他当成推动人类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人物。若达尔文主义是真理，希特勒就是大救星，可我们已经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人类将会为之哀哭切齿。若达尔文主义不是真理，希特勒的图谋必定位居史上滔天大罪之列，达尔文也必定列为史上最具破坏力的一位哲学之父。

“优生学黑暗面的顶峰，自然是阿道夫·希特勒鼓动纯‘雅利安’通婚并杀害他所指的携带劣等基因的600万人以图谋创造一个‘优等种族’。把大屠杀归咎于高尔顿，甚至归咎于他未能预见到他对这件事主张的后果，这是有失公允的。但他无疑是优生学的主要创始人，而希特勒无疑对此学说执迷不悟。因此，就其后果而言，优生学定被列为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项科学谬误。” 75

鸣谢

谨此感谢哲学博士韦恩·福莱尔 (Wayne Frair)，文学硕士约翰·伍德默拉皮(John Woodmorappe)和文学硕士保罗·亨伯(Paul Humber)，感谢他们为本文初稿贡献的真知灼见。

杰里·伯格曼

先后就读于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俄亥俄州鲍灵（又译鲍林、博林）格林州立大学及位于托莱多的俄亥俄州医学院，取得了七个学位，涵盖生物学，心理学，评估与研究等领域。曾任教于鲍灵格林州立大学，托莱多大学，俄亥俄州医学院，还有其他多所学院和大学。目前教授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及人体解剖学的大学课程，也是癌症遗传学领域的副教授级科学家[12]。在各大流行和科学期刊著述颇丰。

参考文献

1. Chase, A., *The Legacy of Malthus; The Social Costs of the New Scientific Racism*, Alfred Knopf, New York, 1980. Return to text.
2. Haeckel, E., *The History of Creation: 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by the Action of Natural Causes*, Appleton, New York, 1876.
3. Haeckel, E., *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 Harper, New York, 1900.
4. Haeckel, E., *The Wonders of Life; A Popular Study of Biological Philosophy*, Harper, New York, 1905.
5. Haeckel, E., *Eternity: World War Thoughts on Life and Death, Religion, an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Truth Seeker, New York, 1916.
6. Haeckel, E., *The Evolution of Man*, Appleton, New York, 1920.
7. Chamberlain, 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nd Vol., (1st Vol. 1899), Lane, London, 1911.
8. Aycoberry, P., *The Nazi Question: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22–1975*, Pantheon, New York. 1981.
9. Beyerchen, A.D.,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1977.
10. Stein, G.,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he roots of Nazism*, *American Scientist* 76(1):50–58, 1988.
11. Tobach, E., Gianusos, J., Topoff, H. and Gross, C.G., *The Four Horsemen; Racism, Sexism, Militar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Behavioral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74.
12. Clark, Robert, *Darwin: Before and After*, Grand Rapids International Press, Grand Rapids, MI, 1958.
13. Ludmerer, K., *Eugenics*, In: *Encyclopedia of Bioethics*, Edited by Mark Lappe,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p. 457, 1978.
14. Keith, A., *Evolution and Ethics*, G.P. Putnam's Sons, New York, p. 230, 1946.
15. Tenenbaum, J., *Race and Reich*, Twayne Pub., New York, p. 211, 1956.
16. Stein, Ref. 10, p. 53.

17. The Nuremberg Trials, Vol. 14,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p. 279.
18. Stein, Ref. 10, p. 56.
19. Poliakov, L., The Aryan Myth,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4.
20. Clark, Ref. 12, p. 115.
21. Hickman, R., Biocreation, Science Press, Worthington, OH, pp. 51–52, 1983.
22. Tenenbaum, Ref. 15, p. vii.
23. Wilder-Smith, B., The Day Nazi Germany Died, Master Books, San Diego, CA, p. 27, 1982.
24. Stein, Ref. 10, p. 51.
25. Jackel, E., Hitler's Weltanschauung,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Middletown, CT, 1972.
26. Rauschning, H., 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 Alliance Book Corp., New York, 1939.
27. Keith, Ref. 14, p. 230.
28. Keith, Ref. 14, p. 105.
29. Schleunes, K., 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IL, 1970.
30. Schleunes, Ref. 29, p. 33.
31. Jones, G.,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 The Humanities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J, p. 168, 1980.
32. Hitler, A.,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by H.R. Trevor-Roper, Farrar, Straus and Young, New York, p. 116, 1953.
33. Hitler, A., Ref. 32, p. 116.
34. Whitehead, J, The Stealing of America, Crossway Books, Westchester, IL, p. 15, 1983.

35. Gasman, D., *The Scientific Origin of National Socialism*, American Elsevier, New York, p. xiv, 1971.
36. Schluenes, Ref. 29, p. 30–32.
37. Poliakov, L., *The Aryan Myth* (translated by E Howard) (霍华德译本),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4.
38. Chase, Ref. 1, p. 349.
39. King, J., *The Biology of R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nd ed., Berkeley, CA, p. 156, 1981.
40. Fest, J.C.,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Pantheon, NY, pp. 99–100, 1970.
41. Mosse, G.L., *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p. 57, 1981.
42. Mosse, Ref. 41, p. 58.
43. Paliakov, Ref. 37, p. 282.
44. Wertham, F., *A Sign for Cain*, The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66.
45. Davies, J.D., *Phrenology: Fad and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1955.
46. Stanton, W., *The Leopard's Spots; Scientific Attitudes Towards Race in America, 1815–185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 1960.
47. Weindling, P.,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89.
48. Schleunes, Ref. 29, p. 31.
49. Clark, Ref. 12, pp. 115–116.
50. Rich, N., *Hitler's War Aim*, Norton, New York, 1973.
51. Wiggam, A. E., *The New Dialogue of Science*, Garden Publishing Co., Garden City, NY, p. 102, 1922.
52. Haeckel, Ref. 2, p. 170.

53. Haeckel, Ref. 4, p. 116.
54. Posner, G.L. and Ware, J., Mengele,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86.
55. Phillips, K.,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eop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Time of Crisis, Random House, New York, p. 164, 1981.
56. Hitler, A., Ref. 32, p. 117.
57. Milner, R., The Encyclopedia of Evolution, Facts on File, New York, p. 206, 1990.
58. Keith, Ref. 14, p. 72.
59. Stein, Ref. 10, p. 54.
60. Mosse, Ref. 41, p. 244.
61. Humber, P., The Ascent of Racism, Impact, February, p. 2, 1987.
62. Hawtin, G., The Living Creature; The Origin of the Negro, Geo. R. Hawtin, Battleford, Sask. 1980.
63. Magne, C.L., The Negro and the World Crisis, New Christian Crusade Church, Hollywood, CA, 1972.
64. Mueller-Hill, B., Murderous Science: Elimination by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Jews, Gypsies, and others, Germany 1933–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23, 1988.
65. Gray, P., Cursed by Eugenics, Time, January 11, pp. 84–85, 1999.
66. Jones, E.M. (ed.), Darwin and the Vampire: Evolu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Holocaust, Culture Wars 17:11, 1998.
67. Fest, Ref. 40, p. 99.
68. Haas, P.J., Nineteenth century sci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zi policy, Journal of Theology, 1995.
69. Hoess, R., Commandment of Auschwitz,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Cleveland, IL, p. 110, 1960.

70. Nordenskiöld, E., *The History of Biology*,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p. 522, 1935.
71. Stein, Ref. 10, p. 50.
72. Hull, D., Uncle Sam Wants You; a review of the book *Mystery of Mysteries: Is Evolution a Social Construction?* by Michael Ruse. *Science* 284:1131–1132, 1999.
73. Rowan, W., 'Charles Darwin', in *Architects of Modern Thought*,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 Toronto, p. 12, 1955.
74. Rowan, Ref. 73, p. 13.
75. Youngson, R., *Scientific Blunders; A Brief History of How Wrong Scientists Can Sometimes Be*, Carroll and Graf Pub., New York, 1998.